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

旷新年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旷新年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9

ISBN 7-5444-0395-5

I. 写... II. 旷...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6466号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

旷新年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7

字数 141,000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本

ISBN 7 5444 0395 5/1·0008

定价: (软精) 15.00元

绪论：不屈不挠的博学

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足轻重和并不讨好的休闲娱乐。文学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这已经成为了困扰许多文学工作者的一件事情。

文学以及人文学科的这种困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米勒中心为美国宪法二百周年庆典举办的一个有关宪法的讲座上，肯尼思提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生的一场重要的争论。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常常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说：“我们不断地发明东西：新的药物、新的治疗方法、新的各种谷物和麦类，而你们这些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当时有人回答说：“你听说过美国宪法吗？”肯尼思说：“这种回答是正当有理的，因为至少一些人会证明，美国宪法也许是以往二三百年来最伟大的社会发明。”^①不论美国宪法是否是三百年内最伟大的发明，可是，它却确实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苏联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的剧变则提供了反面的证明。C.P. 斯诺曾经说：“一个国家的全面工业化任务，如今日的中国，主要是有决心培养足够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只要有决心，不要几年就可以了。”^②他称赞苏联是世界上培养工程师最多的国家。苏联甚至把作家和艺术家也称为工程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以“赶超”方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从20世纪初唯一被亚洲国家打败的落后的欧洲国家一夜之间



变为“超级大国”。苏联成长的神话是“后发优势”的证明，而其崩溃则是“后发劣势”的最好例证。“洋务思维”和“工程师崇拜”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这一个硬币的两面。“后发劣势”致命的根源在于，只看到“有形资产”，看不见“无形资产”，只相信“硬道理”，不知道“软道理”，只知道“经济基础”，不知有“上层建筑”。于是落得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人文学科对于世界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往往被人忽视了——当然，这种影响一般来说不是直接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说：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③

哈耶克长期被视为怪物，他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声名狼藉、无人问津。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在哈耶克高寿的晚年，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了主流思想和新的教条。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在思想上是对立的，可是他们对于思想的重要后果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哈耶克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



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一书中说:“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凯恩斯、哈耶克以及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等人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因此,福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类生活和人类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思想看成多余的。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④

划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用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葛兰西更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认同来实现的。葛兰西称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为“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甚至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够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

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前言里曾经说:

如同人们反潮流地追踪的,以何种方式,语言曾得到了



那般谈论,自然物得到了那般设想和组集,交换得到了那般实施,于是,以何种方式,我们的文化宣明了秩序的存在,以及交换的规律,生物的恒常性、词的序列和表象价值又如何归因于这个秩序的形态;为了构成我们发现于语法和语文学、在自然史和生物学、在财富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那种确实的知识基础,什么样的秩序形态曾经被认可、设定并与时空联系在一起。……它旨在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以便也许以后不久就会消失。因此,我并不关心向客观性迈进的被描述知识,今日的科学最终在其中得到确认;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识型……应该呈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⑤

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工具和框架以及立足点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母语,从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阶级立场,从不同的历史、传统进入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有不同的眼光。某种天赋的身份和信仰实际上具有绝对的偶然性,如果降生在古代的印度,就可能是个佛教徒;如果出生在阿拉伯国家,就可能是伊斯兰教徒;如果你生在法国,就可能是天主教徒;而如果生在德国,就可能是新教徒;如果生在“五四”时候的中国,就很容易用一种“传统”/“现代”的眼光来区别和看待世界。这种偶然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某种“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往往规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选择。因此,重要的并不是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变化规



律和历史脉络。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裁定某种思想是对或是错,而是应该将它们放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将他们置回于历史的具体过程之中。陈寅恪认为,如果将伪书不是简单地视为伪书,则不妨看作某一思想的演变过程。通过某个概念的兴衰起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的大厦是如何建立起来,又是怎样崩溃的。我们并不是要肯定或执著于某一个概念或某一种思想,而是要展示概念流动、扩散的线索和思想生死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要将它们“相对化”。我们要追踪的只是某个概念、思想的脉络,某个概念家族和思想体系的历史。这不是最后的审判,我们只是静观概念的生与死,它的前身,它的投胎,它的解体朽灭,它的灵童转世。

我们大都熟悉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包含了一种阅读和思维方式。《狂人日记》里有一段启示录式的描写:“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也是尼采阅读的方法。不仅要在有字处读,而且要在无字处读;在文字之外,在字里行间读。蒙文通说,读书要“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

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都隐藏着互文的踪迹,都有无边无际的上下文。2003年第2期《读书》上陆建德有一篇关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的书评《不屈不挠的博学》。这是一个很好的意思。他说,萨义德不是抽象地谈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天职,他推荐的是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它意味着“搜集另类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⑥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写道：“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这样写道：‘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你到底是谁，认识到‘认识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唯一可以找到的英文翻译令人费解地到此为止，而葛兰西的意大利原文实际上紧接着还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因此，找出这一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⑦

我们追求中立的态度和客观的知识，但是人文学科却始终并且深深地渗透着价值和权力意志。萨义德在《东方学》里还说：“‘真正’的知识本质上是非政治性的（反之，具有明显政治内含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这一为人们广泛认同的观点忽视了知识产生时所具有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尽管很隐秘）。 ”^⑧福柯说：

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⑨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以及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了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



奖励。归根到底，我们必须生产真理，就如同我们必须生产财富，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生产真理，为的就是生产财富。换句话说，我们受真理支配，因为真理制订法律，真理生产真实的话语，这种话语至少是部分地在权力的效应的基础上裁决、发送和扩展。最后，我们被裁决，被审判，被分类，被注定了要在某种模式中生存和死亡，作为承载权力的特定效应的真实的话语的一种功能。^⑩

所有被讲述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故事，并且总是具有传奇的性质。我们只有通过故事才能接触历史。“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⑪文学史也是一个故事，或者说需要一个故事。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是由谁讲述的？谁有权力讲述故事？

蔡翔的《神圣回忆》中的“红卫兵C”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红卫兵C”的故事有点像鲁迅《故乡》中闰土的故事，但是又不完全止于此。少年时代的C在蔡翔的眼中才华横溢，在红卫兵运动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达到了人生辉煌的顶点。但多少年后，那个英气勃勃的少年不见了，成为了黯然委琐的仓库保管员，在菜市场上和菜贩讨价还价。他仍然保存着“文革”时期的一些材料，但是他拒绝了蔡翔让他写回忆录的请求，而且也拒绝了出借材料的要求：“C断然拒绝了我，他用很不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说：‘你写不了，你根本不理解。’”^⑫我强烈地感受到C对于历史的悲怆和绝望的心情，同时也意识到历史巨大而痛苦的沉默。

加缪的《局外人》被打包好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和存在主义思想的载体被中国的文人学士奉为至宝。萨义德在



《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讨论了加缪的小说《鼠疫》和《局外人》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在加缪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的小说中，阿拉伯人却是无名的。《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索尔特杀死了一名阿拉伯人，但是这个阿拉伯人没有名字，没有历史，也没有父母。同样，在《鼠疫》中，奥兰地方死于瘟疫的阿拉伯人，他们也没有名字。萨义德说：“加缪的冷酷无情说明了为什么被莫索尔特杀害的那个阿拉伯人的背景是一片空白，只字未提，……因此，准确地说，加缪的叙述对阿尔及利亚的地理提出了严肃的、带根本性的优先要求。对于一个对法国在那里的长期活动有一点粗略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就像法国部长查当的说法一样荒诞和怪异。查当在1938年3月曾经声明，阿拉伯语在阿尔及利亚是‘外语’。”^③这正如今天在中国只有殖民思想才是思想，只有“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才是知识。中国知识界将现代主义偶像化和神秘化，将之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然而，韩国学者白乐晴却对《局外人》提出了自己的另一种解读：《局外人》的主人公没有明确动机的杀人，为作者表达存在主义思想提供了机会。可是，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从阿拉伯人的立场出发会是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法国殖民统治以来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之一，它尽管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但是也并非特别的冤枉。而用存在主义来解读，则表现了明显的迟钝。^④这种迟钝正如今天全世界对巴勒斯坦人体炸弹的迟钝。而破除这种神秘化，或者换一个说法，要破除这种迟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屈不挠的博学”。

“新时期”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经典化的过程。有关现代经典作家鲁迅的研究也清楚地显示了“新时期”从启蒙主



义到现代主义解释规范的转移。作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和汪晖的《反抗绝望》清晰地显示了对于鲁迅从启蒙主义解释规范到现代主义解释规范的转变过程。正如在“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将《水浒传》和《红楼梦》以及具有市民色彩的白话小说确立为经典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场文学革命而是一场文化革命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典范的“重写文学史”也是一个旧经典的崩溃和新经典的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是以“纯文学”的策略完成的，但是不论是从动力还是后果来说，它都是充分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经典并不是自然地形成的，而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经典的确立和崩溃的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死灭。因此，经典的确立和崩溃永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不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和瓦解封建主义的经典并且确立新的经典，还是美国以女性主义和少数民族立场对于美国文学史的“重写”，都是一场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被经典化同样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知识分子的话语不断建构为经典的。同时，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经典化的过程中，也树立了启蒙的神话和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而且实际上，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经典也就消失了，不仅“当代文学”的经典《红旗谱》和《创业史》等作品，而且“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都反映了经典的这种命运。

“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美学上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人性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一场文化的冲突——它们



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新时期文学”取代“当代文学”的过程,说到底是一种人性取代了另一种人性的过程。“当代文学”认为理想的人性才是人性,而“新时期文学”则认为丑恶的人性才是人性。于是,“当代文学”以“审美”作为自己的目的,而“新时期文学”则以“审丑”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期文学”认为“当代文学”“高大全”的人性不是人性,只有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才是人性,也因此,“新时期文学”所谓“人的解放”最终必然跌落为“欲望书写”和“身体写作”。所以,“当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冲突与其说是人性与非人性、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冲突,还不如说是不同人性的冲突。也因此,对于“当代文学”的真正理解,必须通过不屈不挠的博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也就是说必须将“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看作是一个“真理”的生产、实践过程。

-
- ① 见尼尔·里默《宪法与1787年政治领域的一种创造性突破》,肯尼思·W. 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三联书店,1997年,第3页。
- ② 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41页。
- ③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0页。
- ④ 《思想批评转型》,《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 ⑤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10页。
- ⑥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谱系学要求细节知识,要求大量堆砌的材料,要求耐心。它的‘庞大纪念物’不是借助‘巨大、美好的错误’一蹴而就的,而是用‘不明显的、以严格方式确立起来的微小真理’垒筑的。简言之,一种无尽的博学。”见杜小真编《福柯集》,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不屈不挠的博学

- ⑦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33页。
- ⑧ 同上书，第14页。
- ⑨ 《权力的阐释》，《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31页。
- ⑩ 《两个讲座》，《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228页。
- ⑪ 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 ⑫ 蔡翔《神圣回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46页。
- ⑬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55页。
- ⑭ 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222页。

目录

绪论：不屈不挠的博学·····	1
第一讲 寻找“当代文学”·····	1
第二讲 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	19
第三讲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创业史》·····	38
第四讲 “寻根文学”的兴起·····	59
第五讲 “新写实小说”的潮流·····	77
第六讲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93
第七讲 余华的小说·····	113

第八讲 小说的精神：《暗示》	129
第九讲 《上海宝贝》：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	148
第十讲 告别“伤痕文学”	161
第十一讲 重写文学史：洞见与盲视	177
附录一 制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制度	186
附录二 文学存在的权力与制度	196
后记	205

第一讲 寻找“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千头万绪,处于无边无际的发展之中,正如中国当代历史在左冲右突中曲折地前行。历史只有通过文本化,才能被我们接触和理解。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已然是一个传说化了的故事,是充满了情感色彩的记忆。关于中国当代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描述为“荒唐的岁月”、“历史的空白”和“十年浩劫”。于是,在直线进步的现代历史图景上,成为了不堪回首的经验,正如谶容用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观的一种想象所表达的——“减去十岁”。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的所有这些记忆都是真实的。然而,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却是一个问题。

一、“重写文学史”与“当代文学”的危机

人们普遍感觉到了“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危机。曹文轩发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在近年来,是一个不断受到质疑的概念”。他说,在有些人看来,“当代文学”是一个“无效的概念”和“不合法的概念”。^①“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流行“从《国际歌》到样板戏”的“左”倾文学史叙述和“历史空白论”,并且导致了“文革”结束后“重写文学史”的发生。然而,“重写文学史”的结果,却形成了新的“历史空白论”。“新时期”以批判“四人帮”的“黑线文艺专政”论开始,可是,最终却同样陷入了另一种“文艺黑线专政”的思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文学史理解,为了



“拯救”当代文学的历史，陈思和提出了“潜在写作”的概念。1949—197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如果不是作为一种“潜在写作”的话——就恰恰可能被排斥于文学史的秩序和合法性之外。对所谓“红色经典”的规避和“潜在写作”的发掘不仅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而且“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和“以边缘为中心”重写文学史已经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基本策略。

尽管“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正式提出是在1988年，但是，实际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新文学史研究构成了一个明显的“重写文学史”的潮流。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②他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一对概念的辩证发展，说明意识形态的转换与文学史嬗变的关系。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史格局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代文学”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设计和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不仅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建构过程中被排斥和沉落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从另一个角度被重新发掘出来并且供奉